

【区域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起点

冯彦明

摘要:所有科学研究的使命都在于弄清楚关于人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人的问题,服务于人类的发展。人的活动方式不同,其认识也不同,进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结果不同,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人类活动的经济学不应离开人这个主体。鉴于此,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起点可以归结为人,中国经济学中的人是多维一元的。人是存在与思维、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体,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人类的认识是可以统一的,而人类的实践是有局限性的,对人类的认识与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统一的。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人的经济学;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29-10 **收稿日期:**2021-03-04

作者简介:冯彦明,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 100081)。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动,所有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活动,都是建立在人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活动;人的活动方式不同,其认识也不同,也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结果不同,当然也决定着人类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人类活动的经济学不应离开人这个主体,也不应离开人类行为和决定人类行为的人的认识这个主题,当然更不应离开为人类服务、实现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个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①“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②。中国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华文明是关于人的文明,中国经济学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关于人的经济学,应当首先回答人现在是什么样的(现实人)和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人)问题,然后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人

如何通过经济活动、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活动成为其应该成为的样子等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从而正确地理解、解读、修正和统一关于人的认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起点是人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根据自己的认识,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作用于社会和整个世界。不同的人由于其不同的认识 and 行为习惯,其作用于社会和世界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将不同。各门科学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人,这是因为人是所有问题的根本,离开了人,也就离开了问题,也就没有研究各种问题的科学。虽然从表面看,自然科学尤其是一些纯粹关于自然的科学如物理学、植物学、矿物学等,似乎与人无关,或者可以与人无关,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反观一下就会知道,这些研究都是人的研究,都是由人进行的研究,研究的直接目的可能是揭示对象世界的规律性,但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而

且,即便是对于同样的问题和现象,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很大不同。我们尤其注意到,由于研究的立场和目的不同,其结论会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离开了研究这些问题和现象的人,不仅没有研究及其结果,也没有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现象,也就没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这里的人既不仅仅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或直接关系人(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属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国家或民族),也不仅仅指纯粹自利的个人,还应包括人类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体,以及人类的思维。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是存在的人而不是假设的人,是与自然和历史相统一而不是脱离了历史、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独立存在或傲慢自恃的人。这里的研究也不一定必须指那些学术的、专门的研究,即便是那些些微的关注,或者不经意间的一瞥,甚至个人加入到习以为常的社会或群体之中,都会对主客体产生影响,导致研究结论的某些改变。因为一方面,正如“薛定谔之猫”实验所揭示的,虽然在揭开盖子之前猫到底是死是活确实无法确定,但不管是死是活,都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是人放进了镭和氰化物;离开了人进行的这个实验,谁还关心这个猫的存在。另一方面,“双缝干涉实验”也告诉我们,人的研究对自然界也确实有影响。

现实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和问题就是忘记初心,缺乏反观。比如,人类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自然而然的的存在前提和自然主宰,然后去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从而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研究,而忘记了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为了提高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人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地对自然界机理的研究,从而出现了初期的技术,如种植和养殖;如此不断进步,各类技术层出不穷。但随着技术的演变和进步,生产效率确实成倍提高了,而劳动强度不减反增,人类越来越异化;此外,人类本是一种社会性生物,不可能独立存在,为了社会生活的顺畅运行,就需要自我约束,相互理解,完善制度,但现实中许多制度也被大大异化了。因此,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关于人自己的知识。人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的思维,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他人和自然界,也就无法很好地认识

我们生存的环境,当然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个人和人类的问题。

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也是统一人的认识的学问。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也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也是全人类的文明。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也是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在。中国经济学扎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用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看待人类经济活动,广纳全人类所有进步成果,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入手,服务于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而对全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这样的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人为起点,以不断完善理想的人为归宿,因此要建立在对人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很好地认识人类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认识自然界这个客体;只有很好地认识“自己”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认识由家庭、村庄(城镇)、单位、民族、国家等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客体;只有很好地认识人类的思维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了解人及其存在这个客体。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学只有从人出发,为人服务,以现实人而不是假设人为研究起点,才能揭示人的真实面目,才能根据人的需要有效配置资源,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真理性,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与此对比,西方经济学可能是缺乏灵魂的。虽然其理论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但这里的“经济人”并不是人,而是没有人的责任的自私自利的生物;其研究对象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中把人(劳动力)与资本等同,成为生产的一个普通要素;其研究和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创造利润。可见,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人的因素,只有僵尸般的生产和流水线。马克思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细胞出发,不仅揭开了剩余价值这一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更揭示了商品经济自发发展、过度发展造成的商品成为人的化身和人退化成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中国经济学中的人:多维一元

迄今为止,人类对人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西方的简单的自利者；另一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合的一元体。

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西方逐步形成了以家庭庄园为主体的私有制，从而开始了人的自利之路。之后西方的工业革命在造就工业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消灭了商业和农业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为新兴资产阶级突破“神”的束缚提供了组织准备和思想试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为新兴资产阶级编制了优胜劣汰的理论依据。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成就”了西方“人”的异化：使得人类在脱离神的主宰的同时，也脱离了自然界而成为高高在上的自我主宰，而且资产所有者脱离了整个人类成了傲慢横行的无赖，无产者也脱离了人而变成了“自由的螺丝钉”，从而造成了在国家认识上的“高贵的雅利安”“纯洁的德意志”“美国优先”和个人认识上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物质财富管理和计算金钱的理性人（经济人），形成了西方从剥削别人开始，到自我毁灭结束的短视行为和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中国原始公有制的解体没有形成私有制，而是形成了“家”有制，这里的家不同于西方的家庭庄园，而是天下一家，即家天下。家长（皇帝）领导、家庭经营（从大国营到小家庭）、上下分层、同级分封、内部平调、限制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过程中，由于“常无欲可观其妙”，中国培育出了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贤圣，因而出现了以儒、道为代表的圣贤之道和圣贤教育，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对人和世界的看法，凝结成绵延不绝、长盛不衰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创造了长达数千年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

对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奇迹，西方人迷惑不解。一方面，17世纪的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这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以及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等，一知半解地将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但遗憾的是，长达数千年的自私传统已使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无私的可能和无私之人，由于他们私欲过重，心浮气躁，没有也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和中

国制度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是“为我所用”地借用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为其遮羞。另一方面，英国的李约瑟利用其对科技的参悟和对中国较长时间的考察，提出了“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中国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应该了解它的统治原理，从而使生物能与它和谐共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把它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⑥，但他不仅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更不知道这种文化和制度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而是想当然地按照西方的逻辑，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从形而下的角度讲，中国文化中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但从本质上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体，是个人与社会（人类）的统一体，是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体，也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人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智慧的存在；人不仅仅是个人，也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自然关系的总和，同时还是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总和。

所谓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即在中国人眼里，整个社会凡圣同居，人的生活 and 成长过程就是逐步修正认识、完善自我、实现去凡入圣即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⑦且全面发展的“君子不器”^⑧的过程。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⑨，而“教之道，贵以专”，因此要通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⑩的“圣人为腹不为目”^⑪才可达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圣人之境界。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⑫。“止于至善”的过程就是由凡入圣的过程，就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⑬的过程。

所谓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亦即天人合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⑭，故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欲真正了解天人合一之理，非当今浮躁、自利之人所能为，更不是西方物欲横流所能解，只有“常无欲（知止）”即一念不生方可“观其妙”“常有欲（贵以专）”即一念不灭方可“观其微”^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⑩

所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亦即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一方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⑪,另一方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⑫;一方面,从诚意正心修身开始,以达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界,另一方面,“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⑬。西方的“家天下”损人害己,只有你死我活,只能零和博弈,永远也理解不了个人如何能与社会统一;中国的“家天下”虽然在落实过程中也曾周期性地出现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但对立的结果或者是统治者觉醒后的自我革新和完善,或者是统治者沉睡不醒而被迫更替和覆灭。因此“家天下”是最接近人与社会统一的制度模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⑮“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⑯“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堵上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⑰

所谓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亦即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同源同宗,既非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也非意识决定物质、思维决定存在,就如既非手心决定手背,也非手背决定手心,而是手心与手背互为条件,同存与共亡。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⑱不论是从现实的某一时点观察整个人类,还是从人类的整个历史中观察任何一个人,都既不存在无物质(存在)的意识(思维)活动,也不存在无意识(思维)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本来互为体,没有思维不称其为人,没有存在(身体)恐怕也不能成为人。

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神学

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人类的智慧(认识)问题,是了解人的多维一元本质的钥匙。

现代量子力学为我们打开了重新认识人类和世界的大门,使我们能够从所谓“科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关系,证明中国圣人的睿智和中华文明的智慧。比如,传统物理学认为可以通过制造出一种足够精准的计量工具来测出一个物理系统的长度、温度或质量;要测量的物理系统的状态是独立于测量工作而存在的,即使停止测量,该系统的物理性质如尺寸距离、温度高低、质量大小也都是不变的,除非发生有限的热胀冷缩或者其他被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是可测的;光速是绝对极限,没有、也不可能超过光速的物质运动。但量子世界的发现意味着这样的认识必须改变:一是宇宙万物都存在着“测不准”这个特性,量子系统的精确测量不仅在实践中不可能,而且“精确测量”在物理上也没有意义;二是“双缝干涉实验”告诉我们,人与物不是相互独立的,有观测者和没有观测者的最终观测结果是不同的;三是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不仅距离不是问题,而且光速也不是极限。如此之类颠覆常识、引起西方认识和物理学革命的发现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早有阐述。《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⑲,又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⑳,还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㉑。其中的第一句说明了“测不准”定理,第二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道理,第三句则说明了不仅量子纠缠,而且万物同源的必然。

人的多维一元有无数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微观与宏观的统一。现代物理学把微观与宏观分开,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这正体现出认识的局限性。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正说明了这种统一性和同一性。

从量子力学角度讲,第一,不管组成世界的物质多大多小,其都一直处于运动之中。不停运动就意味着位置不定,位置不定就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作用力量不定,受到的作用力量不定就意味着速度不定。即使你把某一实在位置固定,但不可能将所有实在的位置固定,实际上哪怕你想固定大部分实

在的位置都是不可能的,这正像数百人甚至更多的人组成的群体,在你固定某一个人或某几个有限的人的位置后,由于其他所有人的位置你不能固定,那么,你所固定的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位置在这一群体中仍然是不固定的,或者只能是相对的。这时,你还可以用传统物理学解释说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位置没有变化,只是其他人的位置变化了,所以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相对位置变化了。但实际上,在一个微观和宏观世界中,比如在地球上,由于地球是动而不停的,不仅自转,而且还围绕太阳公转;不仅公转,而且随太阳在银河系运动,如此说来,你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位置固定在地球上的某一位置,但在银河系中恐怕也是不确定的,更不用说在更大的系统中了。这里说的是位置的相对性,还没有考虑能量的相对性。我们还回到数百人组成的群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变动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人的位置,大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力量就会发生改变,因为相邻的人之间可能有适应或不适应的情况;另外,即使我们不改变任何人的位置——这意味着所有人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如果我们改变一部分人的情绪,比如从无喜无怒的中性依次改变为喜、怒、哀、乐,尤其是大喜、大怒、大哀、大乐,你再观察这个固定人数、固定位置组成的群体,磁场还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所谓的粒子之间的干涉性与绕射现象。粒子不会因为波的正负波动而抵消,只会互相叠加。由于粒子的波动,任何已知的标准都不能对其测量,因为它与动能、位置、位能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既然万物归一,也即天人合一,人是“天”即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人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也具有所有客观实在的特性,同时与其他客观实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此情况下,“观者”的存在就不可能不对被观测者造成影响。中国文化一方面讲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谓酒逢知己,话需投机,饮茶对人,治病对时;另一方面要求认识主体即个人尽可能遵循中庸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体关系,反过来也表明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被观测的世界形成了某种相互关系。

第三,既然万物一元即同质,量子纠缠既是常规,光速就不是极限,意识才是速度的极限。传统哲学讲究因果联系,没有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

同因将有同果,同果必然同因。《大学》上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⑧《道德经》也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⑨中国民间文化也讲千处祈求千处应,都是同一道理。

所谓的现代科学,从好的方面讲,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从另一个方面讲,所有科学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西方认识经历了从地球中心到太阳中心的痛苦转变,现在认识到太阳也不是中心。再如在狭义相对论提出以前,西方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各自独立的绝对存在,牛顿经典力学和经典运动学只考虑了“空”而未考虑到“时”,也就是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次提出了时空的概念,认为时间和空间各自都不是绝对的,而绝对的是一个它们的整体——时空。显然,在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因素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不过,一方面,时空显然不只四维,而是与人的意识相应,有无数维;另一方面,这里的时间与空间相对于观者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外在的存在,而没有把观者与时空融为一体。这也可能正是相对论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在相对论中,虽然有了时空的合一,却没有把观者人合并到时空之中,没有把人也看成是一种“时空”的存在,没有看到观者与其他的时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实际上,在这里,爱因斯坦所说的时空仍然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观者来说的。如果我们把观者也放进这一时空之中——实际上其本身就在这一时空之中,科学将会是另一种景象。

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既缺乏“反观”,更缺乏“通观”,而只具有“直观”。所谓“反观”,就是没有看到所有的研究都是人做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研究,都首先是解决人的认识问题,而所有问题的解决也都是人的认识提高的结果。所谓“直观”,就是只着力去分别所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的事物和现象,只是想去解释世界,而忘记了解释世界的目的是利用和改造世界,利用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人。我们很多人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连自己都改造不了,何谈改造世界?所谓“通观”,就是把

“观”的主体与客体融合起来,特别是要把主体的人融入客体的物和现象之中,同时把客体的物和现象与主体的人联系起来考虑。《大学》要求诚意正心,亦即知止,因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说明了人与物的统一。传统物理学既没有看到人自身,也没有看到人与物的交互作用。由于缺乏反观,所以不知道有通观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未发现有通观的作用,从而使人忘记了反观。量子力学的产生,使人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区别开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又是一个局限。宏观微观本来一体,也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但由于对微观量子世界和宏观宇宙的研究都浮于表面,所以只能发现一些与人现有的思维及模式相适应的相对现象和所谓的规律,而不能参透其本质。

三、认识的共性与普适性

在关于人的问题之中,认识是最基本问题之一。前面说过,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而从人的角度讲,现实中的所有问题既是物的问题,也是识的问题,因而既可以通过改变物而解决,也可以通过改变识而解决。但由于识是能动的,而物是相对稳定的,识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辨别包括识及物的存在及其规律性,从而使人的行为符合规律的要求,也使人本身逐步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正像《大学》开篇所告诉我们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可以说,现实中的问题表面看是物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表面看是人的行为(身体的)问题,需要改变人的行为(即修身)而解决,但从深层看都是人的认识问题,需要通过纠正和提高人的认识才能解决。解决了认识问题,了解了认识的特性和规律,也就解决了人的问题和物的问题。

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人的能力大体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能力,包括认识和分析外界问题的能力,以及认识和分析自我

即反省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二是动手操作即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认识和分析自我的反省总结能力很重要,也最缺乏,因为只有经常的自我反省,总结自己和他人的教训,学习他人的间接经验,才能不断地、尽快地提高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只有提高了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才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认识是个人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事情。认识是人对包括人的思维及客观事物的运行变化规律的认知和了解。虽然一棵树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各人的认识会有不同,但既然都是人,既然都是对人的思维及客观事物规律的认知,那么,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就会存在。因为认识作为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仅会随着个人反应的次数和时间而改变,更会通过学习和接受间接经验,经过长期的和众人的实践检验,通过自省和反观而发生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向,有的是自我升华,发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找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有的则是先入为主地强化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失去了对事物规律的把握和个人认识的升华的机会;还有的可能只是浅尝辄止,停留在原有的认识水平。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果一个人真的想了解并尊重事物的规律,这样的循环往复多了,再加上善于自省和反观,一般人都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使认识得到升华,规律得以把握。人通过认识升化发现的规律是反映事物共性的东西,因而也是具有普适性的东西(认识)。

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过程如此,人的认识及其规律亦如此。既然都是人,既然都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类社会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就必然具有一些让每个人都能承认并接受的共识。在认识论上,我们无需探讨那些客观存在的不同,而是要关注与这种客观存在相关的人们认识上的不同,以及由这种不同的认识所决定的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结果,进而分析是否能达成共识,如何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尽管人生来就有着种种的不同,特别是有着自然环境和条件、社会环境和条件、人种、肤色等的不同,我们也承认人与人、团体与团体(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的不同,但作为人这种有智慧的动物,仅仅承认不同是不够的,还要分析和探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和条件,进而要求同存异,

求大同存小异。我们不能因为那些客观存在的不同而掩盖或者忽视、无视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点。人都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权利。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和权利决定了我们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正是这种人所独具的智慧决定了我们能够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正是经过人类数千年考验和实践证明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基础。

文化是人类认识的总结,文明则是正确的文化。中国文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形式上的包容性,二是内容上的融合性。所谓形式上的包容性,就是中华文化既不排斥和拒绝任何外来观念,也不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礼记·曲礼上》讲“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内容上的融合性,就是中华文化具有的大、德、和、新、省五性。中华文化是“大”文化,即做大学问,立大志向,成圣成贤,以达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中华文化是“德”文化,即德被天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即通过求同而存异而达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意和同悦、利和同均、口和无诤;中华文化是“新”文化,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是“省”文化,即“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不仅要“一日三省吾身”,还要“慎独”“知止”。总体来看,“省”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和”),就能有所得(即“新”),“和”则共享、包容,“新”则进取、创新,最终实现对内和谐、小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讲技术竞争、知识产权而非文化融合、心灵升华的“新”,讲丛林法则、零和博弈而非求同存异、共享共赢的“和”,讲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而非仗义疏财、安贫乐道之“德”,讲统治世界、奴役人民而非止于至善、上善若水之“大”,这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特别是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实践和“碰壁”之后仍然存在这样的不同,西方仍然固执己见,是因为西方自私的发展模式造成利令智昏,而西方文化中又缺少“省”这一要素,不会自省、反观,只会转嫁和埋怨(别人),因而也就没有自我革命、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局限性,是其不能形成共识的根源所在,也

是导致个人分裂、社会对立、经济危机、文化冲突、政治无能、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与此相对比,中华文化秉持“大、德、和、新、省”的统一,绵延数千年屹立挺拔,就在于这“五性”反映了人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也正在于这统一的“五性”能帮助我们发现规律,达成共识,凝聚力量,形成统一的发展动力。体现这“五性”统一的文化,以及由此文化所决定的认识,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超越民族、种族与国家的界限,超越地域、性别与年龄的差异,成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共同方案,成为实现全人类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目标。

1988年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的《巴黎宣言》指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求智慧”;1992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的宗教大会上,参会的6000人要确定一个全球人都遵循的黄金规则,大会最终找到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认为这条伦理原则可以成为被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

西方有系统理论,但缺乏系统理论的应用。根据系统论原理,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在整体上的性能和功能并不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相加,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也不是它的各个组成要素的随意凑合,而是按照一定规律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因此,系统理论一方面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团体(企业)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相关性,因而说明了不同国家、不同团体、不同个人之间有着必然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看问题要具有长远眼光和整体意识,既不能为眼前利益所迷惑,也不能为局部(个人、团体、国家)利益而晕头。

由此我们说,通过自省实现换位思考,通过换位思考达到互相理解,通过互相理解达成一定的共识,这正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的中国经济学,其生命力,其不同于历史上、国内外各种流派的根本,也在于此。

全球问题,大到全球治理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小到个人生存与发展、家庭与家庭之间的

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要靠人的方法去解决,靠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法去化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所欲求也勿求于人。既要消除零和博弈的强盗式单赢思维,也要消除“行贿受贿”的腐败式双赢思维,秉持我你他、本地边缘异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赢”,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四、实践的能动性与其有限性

实践是人类的日常活动。虽然在哲学上实践被定义为主观见之于客观,包括了客观对于主观的必然以及主观对于客观的必然两方面内容,又分为为满足人类生产而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实践、以调整 and 改革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为目的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以探索宇宙间普遍规律为有目的的科学实践三种具体的形式,但实际上,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无不在实践,无不是实践。

“实践”一词很热,这不仅是因为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彻底的、全面的改革开放,也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离开了实践也就失去了认识的源泉。不过,我们认为对“实践”的认识似乎还远远不够准确和完善。

第一,所谓的三种实践活动都是“物质的”实践活动,都是个人或人类对客体的活动,而缺乏人的自我实践,即中国文化讲的“慎独”和“吾日三省吾身”的通过反省而改变自我认识、改造自身缺点、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也是前述的只是“直观”,而缺乏反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的发展是单向的,只是从“外部”攫取,也必将随着外部资源和能量的枯竭而灭亡。

第二,实践是人能动的活动,因此是人有意意识的活动。不管过去所总结的三类实践活动是否全面,但包括这三类在内的人类所有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因而都是人类能动的活动,从是否开始实践、开始什么样的实践、如何进行实践、预期达到的目的等,都是人们事先设计好的,至于说能否完全按照预先的设计进行下去,特别是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则是另一回事,也是新的实践的背景和基础。既然实践是能动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意味着人是带着主观意识去活动的,人类的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意识(认识)基础之上的活动,因此可以说,

不仅不是实践产生意识和认识,反而是意识和认识首先指导实践。当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可能发现认识上的问题,引起认识的改变和修正,但无论如何,人在实践之前既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在一张白纸之上实践的。实际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仅包括上述三类,人生在世无不是在进行着实践,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是实践,科学研究是实践,日常的吃饭穿衣、睡觉学习也是实践,这些实践活动无不是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相统一的活动。既然实践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也就不存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问题。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认识的先天正确性,也不意味着人的认识是先天固有的,更不意味着人的认识是不能改变的。正像毛泽东主席所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显然,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只能从社会的实践中来。不过,我们要注意,毛泽东主席这里说的是“人的正确思想”,而不是人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与人的意识显然不是一回事,或者说,人的正确思想与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只有经过了实践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从最初起源以及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本来是一个统一体,不存在无物质的意识,也不存在无意识的物质。其中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人所能见到和认识到的最高等的动物,是物质与意识有效融合的典范。可能其他物质的意识,比如土石砖瓦,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其他更高等的动物,如不与人处同一时空的物种,以及外星人,我们人类还没有见到或认识到,甚至还可以说,或许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不一定正确。因此,实践活动既不是纯粹的物质活动,也不是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物质活动与意识活动的统一。当然这里也需要注意,哲学上的物质并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而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但不管其他物质是否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实践这一“物质”是不可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包括实践在内的所有物质都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

第三,人的实践活动是有限的,因此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有限的。实践之所以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实践是个人的活动,一般来说,任何个人的

实践活动都不可能穷尽全人类的实践活动,这决定了个人由实践产生和形成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其次是因为实践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活动,虽然历史是延续的,人类也是延续的,但一定时期的人类的实践不仅很难完全复制和体验前人的实践,也更难代替后人的实践,由此所产生和形成的认识也将具有局限性;最后,即便是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条件不同,背景和目的不同,所积累的认识不同,其实践的形式、效果特别是其产生的新认识也会不同。由此可知,由于人类的实践具有局限性,人类的认识也有局限性,实践对认识(真理)的检验也就是有限的:今天检验正确的东西明天不一定正确,这里检验正确的东西,放到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正确,个人检验正确的东西,别人不一定适用。

既然实践是有限的,既然我们不可能事事都经过实践,我们就要接受别人的实践经验,事实上我们也必须承认,前人积累和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文化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前人的实践不同于我们今人的实践,我们同样可以说今人的实践也不同于后人的实践,必要时我们也可以事事都实践一下,如果你有的是时间;如果不可能,那就只能接受。当然,这里的接受也不是盲目的接受,也不应该盲目地接受,我们在接受的同时也要实践检验,事实上我们的接受就是一种实践的检验,我们接受之后还可以进行专门或非专门的实践检验。

第四,实践是可以改变的。不仅实践的物质性活动可以改变,更重要的是,实践的意识性活动也是可以改变的,只不过这种改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被动的改变,是不得不的改变,是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的改变;另一个是主动改变,指通过自省之后的改变,也是通过反观而达通观之后的改变。如果说前者可能造成怨天尤人,听天由命,后者则是实现人的深化和升华,达到去凡入圣。

五、标准的统一与绝对性

前面说明,中国文化是一元论者,这不仅仅是万物一体,人、物同源,更是说做人、做事的标准要统一,不能人有人的标准,物有物的标准,更不能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标准。标准的统一性,首先在于标准对象的统一性。

相对于人类来说,既然都是人,都生活在这个

地球上,都是地球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不同的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会有不同,甚至有时差别很大,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智慧,就在于其能够智慧地处理问题和分歧,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反省,达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分歧看到同质,透过局部看到整体,透过当前看到未来。

所谓不谋一世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众多的所谓“古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得以保存至今,并继续展现出勃勃生机,很多人对此进行探讨,但始终如用管窥豹,不得实质。其实,文明就是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总结和结晶。凡是与人类生产生活紧密结合、正确反映人类生产生活规律、适应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才得以保留并延续;而那些不适应人类生活,甚至脱离人类生活的东西,即便在当时被封为“圣典”,也将是昙花一现。依此来看,古埃及“文明”以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为其象征,虽然狮身人面像代表了勇敢和智慧,但金字塔所代表的“阶层”和“统治(地位)”才是其根本;古巴比伦“文明”以汉谟拉比法典和空中花园为其象征,虽然其中的空中花园不乏建筑、生物、水利等文明成就,但汉谟拉比法典的严苛更代表了古巴比伦王国“统治”的残酷;古印度“文明”以婆罗门教和瓦尔纳种姓制度为其象征,虽然后期产生了佛教,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统治依然固——婆罗门教本身就是瓦尔纳制度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这三大古国虽有“古”之年代,但无“文明”之认识与境界,缺乏人的智慧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后人所称的“文明”只能算是统治方式或统治思想:或者是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如古埃及、古巴比伦,或者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统治方式,如古印度。既然是统治方式,由于其缺失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沃土滋润,导致了统治(者)是常变不定,因此,其方式也必然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变更,随着统治(者)的崩溃而灭失。与此相对照,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讲究平等,即“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于人”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提倡以德治国(家),辅之以法治(家规),即“为政者,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出发点是平等,基础是人类对其自身及其环境的正确认识,体现的是“人(人类)”的需

要,反映了维护“人(人类)”秩序的要求。因此,中华文明既非统治者统治的方式和思想,也非为统治者设计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既不是中华民族的孤芳自赏,也不是为中华民族编织的“皇帝的新装”,而是关于人的学说,是人的文明;是每一个个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反映,也是每一个“家(庭)”的需要和家规的基础,更是整个国家、人类的需要和持续发展的保证。中华文明由于其是关于人的文明,只要有人存在,就需要这种文明;只要人类延续,就会运用和发展这种文明。由此我们明白,中华文明既不是中国的文明,也不是中国人的文明,还不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而是全人类的文明,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需要,是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些人认为,现实世界纷繁复杂,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判断人的认识和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因此表现出为所欲为,无所不为,甚至无恶不作。实际上,这或者是由于利令智昏,或者是由于年少无知。中国古代圣人早就指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⑧,这是我们判断任何人的任何认识和行为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这里的“己”既可以理解为主体的“我”,也可以理解为空间的“本地”,还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当下”“当时”“现在”;这里的“人”既可以理解为客体的你和他(她、它),也可以理解

为空间的边缘和异地,还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过去和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是能够突破个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这三个纬度的“三赢”目标,即实现我你他、本地周边异地和过去现在未来共赢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而其他如单赢和双赢都是不正确的。

注释

- ①④⑤⑬⑯⑰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1-2、21、49、57页。② 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https://news.163.com/20/0131/17/F481TDC5000189FH.html>, 2019-08-19。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⑥ 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338-339页。⑦⑧⑱《论语》第2章“为政篇”。⑨⑩《道德经》第12章。⑪⑫《道德经》第3章。⑬⑭⑮《大学》。⑯ 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日报客户端2019-03-24。⑰⑱⑲《道德经》第1章。⑳《孟子》“尽心章句下”。㉑㉒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2、147、162页。㉔《道德经》第2章。㉕《道德经》第25章。㉖《道德经》第42章。㉗《道德经》第47章。㉘《中庸》。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ics

Feng Yanming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al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o figure out human problems, to solve human problems on this basis, and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different ways of human activities signify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als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ways and results of economic operation. Therefore, economics that studies human activitie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should not leave the subject of human beings. Given th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ics can be attributed to human beings. People in Chinese economics are multi-dimensional and unitary. Man is the unity of existence and thinking, reality and ideals,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t is the unity of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Human understanding can be unified, but human practice has limit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the behavior is correct or not should be unified.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ics; Human Economics; Chinese Culture

(责任编辑:晓 力)